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俄]巴托尔德 著
张锡彤 张广达 译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蒙古入侵时期的 突厥斯坦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11月

蒙古人侵时期的 突厥斯坦

——新疆的蒙古统治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俄]巴托尔德 著
张锡彤 张广达 译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蒙古入侵时期的 突厥斯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俄〕巴托尔德著 张锡彤、张广达译. —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5325-4264-2

I. 蒙... II. ①巴... ②张... ③. 张... III. 中亚-历史

IV. K3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1691 号

本书根据 1928 年英文本第 1 版译出;再据 1963 年俄文本第 2 版(亦即收入《巴托尔德院士全集》第一卷的、经过彼得鲁舍夫斯基参照 1928 年英文本进行修订增补的俄文本)译补与校订,并纳入 1968 年英文本第 3 版中的订正。译稿由本社参照 Porcupine Press 在美国发行的英文本第 4 版(1977 年)审订。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全二册)

〔俄〕巴托尔德 著

张锡彤 张广达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 www.ewen.cc

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8.5 插页 13 字数 782,000

2007 年 6 月第一版

200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600

ISBN 978-7-5325-4264-2/K·797

定价 7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络

关于成吉思汗游牧帝国建立的过程及其结构的基本特征,我们曾在另文^①中试加阐明。至于今日,蒙古族的传说,依然几乎是研究十二世纪蒙古史的唯一资料来源。关于这些传说,虽然我们一直殷切期待着当代人的撰述能向非汉学专家提供比迄今已经提供的更为确切的证实,但是,截至目前,我们认为,我们在另文中试作的结论还没有更改的必要。口耳相传的历史叙述难免夹杂着一些离奇怪诞的情节,除了这些,蒙古传说本身并没有哪些地方违反事理之常。特别是有关游牧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的叙述,更令人感觉其颇为真实:当时中国政府经常挑拨一群游牧人反对它所认为危险的另一群游牧人,斗争甫告结束,它又采取同样的手法来对待前此曾和它结盟的游牧人。十二世纪中叶,统治着中国北部的女真族金朝曾对蒙古-鞑靼(Mongku-tata)部落即蒙古人用兵。1147年,金人与蒙古主熬罗-字极烈(Aolo-botzile)议和^②。瓦西里耶夫教授^③与别列津教授^④都倾向于推断熬罗-字极烈是相当于突厥-波斯语中

① Бартольд,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мперии Чингиз-хана*, 页105以下。此文英文撮要见 Skrine and Ross, *The Heart of Asia*, 页151以下, 德文撮要见 Stübe, *Tschingiz - Chan*, 页532以下。尽管施蒂贝本人虽说明他撰写此文只是为了扼要传述我的研究所得,而哈特曼(M. Hartmann, *Der islamische Orient*, II, 页598)却仍然说施蒂贝所发挥的是施蒂贝自己的见解。

② Васильев, *История и древности*, 页79; Pelliot, *À propos des Comans*, 页146。

③ Васильев, *История и древности*, 页52, 79。

④ 拉施都丁书, Березин 刊本, XIII, 译文, 页185, 注。

R447

382

们从不曾看到游牧统治者用过这一官名的例证。我们认为熬罗 - 孛极烈这一名称的前半很可能就是蒙古传说中提到的忽图刺 - 合罕 (Qutula - Qaghan) 的汉名省文^①。这一蒙古朝代至少延续到 1161 年,在这一年,金主下诏出征蒙古 - 鞑靼^②。此后不久,蒙古人多半遭到捕鱼儿海子一带的塔塔儿人 (Tatars) 的蹂躏;但在十二世纪末年,中国政府已经觉察有煽动克烈部 (Kerays 或 Karāyits) 和蒙古人反对这些塔塔儿人的必要。正是在这些战争中,铁木真率领一支他从草原贵族中征集来的队伍崭然露头角。在战胜塔塔儿部之后,克烈汗自立为东部蒙古的首脑,于是蒙古军亦拥立其首领铁木真为合罕 (Qaghan);在克烈部王罕同意下,铁木真接受了合罕的尊称,也重新采用了忽图刺 - 合罕去世后曾在蒙古本部一度消失的“蒙古” (Mongol) 这一家族称号。依据孟珙的记载^③,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一词只是国号,蒙古本族完全不知道这一名称。其后,在元朝公文中,蒙古人及与蒙古人合并在一起的各部在中国境内被称为蒙古,而在蒙古境内仍称鞑靼 (tata^④, Tatars)。铁木真采用蒙古一词称其所部,意在宣布他是忽图刺 - 合罕的继承人,从而强调了他和忽图刺 - 合罕的亲属关系 (但多半并无亲属关系可言)。据蒙古人的史诗传说 (即世人所知之《元朝秘史》),铁木真当时设置了十种官职,但此中除扯儿必 (cherbi) 一职外,其余官名均不见于《秘史》的蒙语原本,《秘史》仅仅记载了他们的职司。这些官职如下所述^⑤:——

(1) “带弓箭的”四人;是为日后之火儿赤 (korchī, 意为弓箭手)。

(2) “管饮膳的”三人;蒙语原本更分为掌早膳与掌晚膳之官;日

① [如伯希和指出的,botzile 一字 (古音读作 bōgila) 多半是一种爵号,后来被满洲人采用,转为 beile (贝勒)。伯希和认为不能从“Aolo”一词看出它是 Qutula - Qaghan 的汉名省文 (参看 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页 24 - 5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页 16 - 7]。]

② 《元朝秘史》,Кафаров 译本,页 14,173,注。

③ Васильев, История и древности, 页 219 - 20。[孟珙应作赵珙,参看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跋》,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蒙鞑备录笺证》。]

④ 《元朝秘史》,Кафаров 译本,页 172,注。

⑤ 同上书,页 62; (汉文本,卷 3,页 124);参照别列津教授的解釋 (拉施都丁书,Березин 刊本,Ⅻ,译文,页 225 - 7,注。)关于此项材料的蒙语原文,蒙 A. O. Ивановский 教授指教,敬致谢忱。

后为不哈兀勒(bukawul^①)或保兀儿赤(bawurchi)。

(3) “牧放羊只的”一人;拉施都丁书中称此职为御牧场的阿黑塔赤(akhtachi of the Court stud)^②。

R448

(4) “管修造车辆(tergen,帖儿坚)的”一人;后为禹儿赤(yurt-chi);据拉施都丁书,此人被任为千户,监管牝马^③;晚年,调任不哈兀勒或保兀儿赤^④。

(5) 扯儿必(cherbi^⑤)一人,“总管家内人口”。

(6) “一处带剑的”四人,四人的首领为铁木真之弟术赤-合撒儿^⑥。

383

(7) “掌驭马的”(akhta^⑦,阿黑塔,后为 akhtachi,阿黑塔赤或阿黑剔赤)二人;二人之一为铁木真之弟别里古台。

(8) “管牧养马群的”三人。

(9) “远箭近箭”(蒙语远箭作 Khola,近箭作 Oira)四人;这些十分

① 在乃蛮及其他若干部落中,bukawul一词作 qunsāt,东部蒙古读若 qunjāt(拉施都丁书,Березин 刊本,原文,Ⅻ,页234;译文,V,页176;Ⅻ,原文,页210;译文,页130)。〔伯希和在著者所引出处外,又补入XV,原文,页210;译文,页140,并指出更正确的读法当作 qisat 或 qīcat;参看 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页25-7〔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页17-19〕。〕〔Bukawul(不哈兀勒)=品评食物的人,汗廷及军队给养的管理人员,军需官。字源不明,参照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II, 页301-7, No. 755. 伯希和在 Notes sur le *Turkestan* 文中认为 qishat 可能与突厥语根 qī sh- 有关,后者意为“压碎”或“打碎”。——C. E. B. 〕。

② Березин 刊本,原文,Ⅶ,页283;译文,V,页213。

③ 同上书,原文,Ⅶ,页283;译文,V,页213。

④ 同上书,原文,Ⅶ,页234;译文,V,页175。

⑤ 术兹贾尼(Raverty 译本,II,页979)将扯儿必(Cherbi, Raverty 误作 jazbi)译为哈吉卜(Hajib);〔Nassau Lees 刊本,页340作 jazbi〕。

⑥ 〔如伯希和指出的,这些人事实上是执刀的人,犹之乎火儿赤(见下文)是带箭囊的人;后来这些人被称为云都赤(ılduči),旧蒙古语中作 ildūci(参看 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页27〔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页19〕。〕

⑦ 〔Akhta 原意为“骑”,后谓“乘马”,因蒙古人通常仅乘驢马,参照 B. Vladimirtsov, *Le régime social des Mongols: le féodalisme nomade*, 巴黎,1948年,页45。此一蒙古突厥名词大约起源于伊朗语,参照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I,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Wiesbaden, 1963年,页114-7, No. 8, 又页117-8, No. 9(关于 akhtachi, “驭马的人”=阿拉伯-波斯语 Amīr-i Akhur)。——C. E. B. 〕。

可能是传达汗命的人员,主要指专使而言。金朝就有递送“信箭”的惯例^①,后来蒙古帝国更有专名以称内藏密札^②的箭支。

(10) 据说有两位勋贵被立为元老,或如蒙语原本所称,被委任为会议的“守护者”。关于他们的职司,并没有更详细的说明。他们作为汗的谋臣,所承担的任务很可能是维持会场秩序。此处提到的两位人物,在成吉思汗朝廷上一直居于极其显赫的职位:博尔术(孛斡儿出)——那颜坐在汗的右手,位于诸将官之上^③;者勒蔑,为护卫军(keshik,怯薛)长官之一,据称“位高于彼者二三人而已”^④。

R449

1203年,铁木真击败克烈部,成为东部蒙古的首要人物,于是着手进一步整编护卫^⑤;在这番整编中,我们开始遇到蒙古名称。七十人被选作白天的护卫,八十人被选作夜间的护卫;前者称土儿合兀惕(tur-gewuts,散班),后者称客卜帖兀惕(kebtewuts,单数作客卜帖兀勒,kebtewur,宿卫)^⑥。这些以及其他的人共同组成汗身边的护卫(怯薛歹, keshikten,单数作怯薛, keshik^⑦,意为轮番值班)。护卫以内也包括弓箭手(火儿赤)、侍膳者(保兀儿赤)、门卫(原文不清楚,可能是 eguden-

① 《元朝秘史》,Кафаров 译本,页191,注。

② 多桑,《蒙古史》,Ⅲ,页434,〔冯承钧译本,下册,页151〕。

③ 拉施都丁书,Березин 刊本,原文,Ⅶ,页271;译文,Ⅴ,页161。

④ 同上书,原文,Ⅶ,页190;译文,Ⅴ,页143。〔据伯希和的意见, keshik 的读音只是到十四世纪才固定下来,在此以前,有两种并行的读音,即 kăzik//kăzak。前者保存在察合台语与若干波斯著作家的著作中;但在蒙古语中后来转为 kăsik,又由此转出 keshik。从后一读音转出 kăsik,元代汉文转写的怯薛,正代表这一读音。参看 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页27-9〔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页19以下〕。〕

⑤ 《元朝秘史》,Кафаров 译本,页102-8;〔汉文本,卷7,§191〕。

⑥ 拉施都丁书中的 kabtawul(Березин 刊本,原文,Ⅶ,页48;译文,Ⅴ,页38),当即此字无疑。别列津教授误读为 knawul,并认为此字来自动词 kit·m·k(意为走开,离去),参看同书,Ⅴ,页230。同是此字,在另处(同书,ⅩⅤ,原文,页204;译文,页137)不作 kabtawul,而作 kăytawul。〔如伯希和指出的, turgewut 应读作 turqa'ut,这是 turqaq(= turghaq)的复数,此名系借自突厥语; kebtewut 的单数不是 kebtewur,而是 kăbtă'ul,波斯文转写作 kabtawul。参看 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页29-31〔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页21-4〕。〕

⑦ 拉施都丁书中通常作 kazik。别列津教授强解 keshikten(怯薛歹)为有福之意(同上书,ⅩⅡ,译文,页185,注)。加特麦尔曾集有 keshik 一字之多种用例(拉施都丁书,Quatremère 刊本,页309-11,注)。

chi, 额闷阔赤, 来自蒙语之 eguden 或 uden, 此言门) 和圉人(阿黑弱赤)^①。扯儿必掌管内务, 数目增至六人。除此之外, 选“一个名勇士”(把阿秃儿, bahādurs) 组成汗的近卫, 战时充先遣队, 平日则为汗廷护卫的一部分。护卫当值, 每三日轮换一班。

1206 年, 铁木真击败了乃蛮部, 杀札木合, 混一蒙古诸部, “升起旗帜, 上有九个白尾^②, 即皇帝位”; 同时, 据官方记载, 取号成吉思汗。是年, 汗的护卫进一步改组^③。客卜帖兀惕先增至 800 人, 继增至 1,000 人; 火儿赤先增至 400 人, 继增至 1,000 人; 同样, 土儿合兀惕亦增至 1,000 人; 又仿照“千名把阿秃儿”的编制续编 6,000 人, 也并入护卫以内; 至此, 护卫共达 10,000 人之数。护卫分四班当值(qarawul, 合刺兀勒), 每班和从前一样, 仍值勤三昼夜。史籍记载选充护卫的方法如下: 旧编制中任千户长的, 其子入选, 各带亲族一人, 伴当十人, 十户长及普通自由人之子带亲族一人, 伴当三人。此外通令“若有人愿要充作(护卫), 诸人休阻当者”。夜间守卫汗帐的规章特别严格: 入暮, 任何人不得绕帐来回走动, 违者由宿卫加以逮捕; 任何人非由护卫跟随, 不得入帐; 任何人不召入帐, 护卫要对他使用武器。任何人不得询问某日护卫人数; 违者罚一匹带鞍的马和衣服。

护卫纪律森严, 无故不值班, 初犯答三十下, 再犯答七十下^④, 第三次犯答三十七下除名。掌管护卫的官人忘记提醒部下按时值班, 所受责罚同上。另一方面, 护卫享有很大的特权。护卫中的战斗兵, 级别高

① “阿黑弱赤”(akhtachi)一词亦见于《元朝秘史》关于桑昆事迹的记述中, 原文见 Pelliot, À propos des Comans, 页 180, 注。〔参照《元朝秘史》, 汉文本, 卷 7, § 188。〕

② 据孟珙的记载(Васильев, История и древности, 页 231), 在旗帜的正中着一黑月。〔依伯希和的订正, 应作“一面九尾白旗”; 关于九尾白旗的意义, 参看 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页 32。至于孟珙(应作赵珙)所说的旗帜, 乃是木华黎(见下文)的旗帜。伯希和认为, 黑月只是木华黎旗上的标志, 而不是成吉思汗旗上的标志。〔参照冯承钧,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 三编, 页 25〕。〕

③ 《元朝秘史》, Кафаров 译本, 页 125-30; [Козин 刊本, 页 169 以下]; [汉文本, 卷 9-10; § 224-34]。

④ [《元朝秘史》卷 9, § 227 汉译文作“若有合入班的人不入者, 答三下, 第二次又不入者答七下, 第三次无故又不入者答三十七下流远方去者”。]

385

于在外的千户；非战斗兵高于在外的百户。掌管护卫的官人无权擅自处罚部属，须将有罪的人的行为详报大汗；当时有这样的规定：“（任何人）将所管的人擅自用条子打的，依旧用条子打他，用拳打的，依旧用拳打他。”护卫以汗的贴身近侍的身份在远征中也保有这种特权。成吉思汗在一次派遣速不台——把阿秃儿出征时对他讲，“若有违号令者，我认得的，便拿将来；不认得的，就那里典刑了”^①。护卫只有在汗亲自出征时才参加战斗；安营时，原有的“千名把阿秃儿”驻扎汗帐之前，火儿赤和土儿合兀惕驻扎汗帐之右，其余 7,000 人驻扎汗帐之左。千名把阿秃儿与组成原来护卫一部分的兵士比其余的护卫人员享有更大的荣誉。

R451

成吉思汗的大多数将领出身于护卫，正是靠这种制度，整个帝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才为汗曾亲自考核过的人物所掌握。这些将领建立的功勋也恰好说明成吉思汗何等善于用人和知人。对成吉思汗所选拔的人物来说，人民群众不过是听任摆布的工具。虽在据称是传自成吉思汗的一些箴言中，也不见有一处提到全体百姓，更无一语道及他给百姓带来了什么利益。他所津津乐道的只是他曾为他的后人和追随他的贵族们作了些什么事情。诸王、“那颜”（noyon），构成帝国贵族的最高阶层。成吉思汗的季子拖雷称“大那颜”^②，他是他父亲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③；成吉思汗的两个弟弟帖木格与别里古台^④亦称那颜。概括说来，成吉思汗诸昆弟的后嗣中，只有术赤——哈撒儿的后人得到了列为王子的权利，余皆列为贵族^⑤。军事贵族称答剌罕（tarkhans），在这一点上与突厥人相同。术外尼述及^⑥军事贵族的特权如下：免纳所有赋税；

① 《元朝秘史》，Кафаров 译本，页 111；〔Козин 刊本，页 153—4〕；〔汉文本，卷 8，§ 199〕。

② 拉施都丁书，Березин 刊本，XII，〔原文，页 126，ulugh noyon〕；译文，页 77。〔博伊尔在所撰“On the titles given in Juvaini to certain Mongol princes”一文中（见 HJAS，第十九卷，1956 年，页 146—8）说明：为了在拖雷逝世后不再直呼其名，故予以“大那颜”的称号。——J. A. B. 〕。

③ 《原文史料选辑》，页 105（术外尼书，同书，Qazwini 刊本，I，页 29）。

④ 拉施都丁书，Березин 刊本，XII，〔原文，页 97, 100〕；译文，页 60, 62。

⑤ 同上书，〔原文，页 87〕；译文，页 55。

⑥ 《原文史料选辑》，页 104（术外尼书，同书 Qazwini 刊本，I，页 27）。

出征或围猎时所得虏获物均归他们个人私有^①；无须经过特许，得随时进入汗廷；犯罪九次不受责罚^②，而且这一规定仅指犯罪应死的场合^③。举行宴会时，答剌罕处于荣誉席位，各蒙赐酒一觥^④。

386

像成吉思汗以前所有游牧民族的旧制一样，统军的将领分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成吉思汗在位时，主要万户有三人。一为左手万户或称东翼万户（蒙古人以南方为最尊^⑤）木华黎（木合黎）；一为右手万户或称西翼万户博尔术（字斡儿出）；一为“中军”万户^⑥纳牙。据拉施都丁的记载，纳牙只是木华黎的副职；博尔术那颜也有一位副职，但就今所知，这位副职的称号不见于蒙古史料，而拉施都丁书所记读音也很可疑^⑦。士兵不得任意从此一将领麾下转到另一将领麾下，违者当众斩首，接受这种士兵的将领也要受严厉处分^⑧。大汗畋猎有严密的规程。在蒙古人建立的各国中，畋猎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活动，它首先是补充给养的一种手段，此外还具有军事演习的意义^⑨。违反畋猎规程，有时甚至处以极刑^⑩。后来成吉思汗责成长子术赤专管畋猎事宜^⑪。

R452

民政组织工作尤为繁难。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其文化水平无疑很低，即与克烈、乃蛮等同类部落相比，亦位于其下。因此，继统一蒙古之后，在侵入文明地区以前，迫切需要向新臣服的人民学习先进文

① 参照《元朝秘史》，Кафаров 译本，页 98, 124。

② 参照同上书，Кафаров 译本，页 115, 116, 120, 122, 124；〔Козин 刊本，页 159, 161, 164, 166, 167〕。

③ 同上书，Кафаров 译本，页 223，注。

④ 同上书，Кафаров 译本，页 98, 123；〔Козин 刊本，页 141, 167〕。

⑤ 同上书，Кафаров 译本，页 83〔Козин 刊本页 127 的译文与此异〕，203，注。参照普朗·迦尔宾关于南向礼拜成吉思汗灵魂的记载，Языков 刊本，页 84；参照 D' Avezac 拉丁文刊本，页 621；不见于 Rockhill 译本。

⑥ 《元朝秘史》，Кафаров 译本，页 116 - 7, 124；〔Козин 刊本，页 161, 168〕。

⑦ 别列津教授在一处认为这一称号的读音应作 sūtūkarsūn，相当于蒙语之 sutukersen，此言“优美的”，“聪明的”（拉施都丁书，Березин 刊本，原文，Ⅶ，页 260；译文，Ⅴ，页 195, 297，注）；但在其他数处（XV，原文，页 198, 199, 205, 209）又读作 sūnkūsūn，并假定此字与突厥语 sūnik（音为“以后”）有关（同上，页 177）。

⑧ 术外尼书，ГПБ IV, 2, 34 抄本，叶 12；Qazwīnī 刊本，I，页 24。

⑨ 多桑，《蒙古史》，I，页 404 - 6，〔冯承钧译本，上册，页 156 - 7〕。

⑩ 术外尼书，ГПБ IV, 2, 34 抄本，叶 10；Qazwīnī 刊本，I，页 20。

⑪ 《原文史料选辑》，页 104（术外尼书；同书，Qazwīnī 刊本，I，页 29）。

化。根据某些传至今日的有关文献,最早(甚至在1203年以前)把文明带到成吉思汗的朝廷上的是一些穆斯林商人^①,这些商人对成吉思汗的影响如何,今已无从得知,不过,他们很可能对护卫的编制规划有所献替。1206年征服了乃蛮以后,蒙古国家在处理政务上开始使用文字;乃蛮汗的掌印官畏兀儿人塔沙统^②在成吉思汗的朝廷上受任同一官职,并奉命教大汗诸子用畏兀儿字母写、读蒙古语言。术外尼说^③,鞑靼人没有自己的字母,蒙古青年必须从畏兀儿人学习写和读,以便日后辑录札撒,即蒙古人的习惯法。史称汗印分为两种,用突厥语称之为阿勒谈合(al-ṭamgha)与阔克谈合(kok-ṭamgha),意即朱印和青印。朱印一词屡见不鲜^④,青印多半只用在最隆重的场合,主要钤盖在送达汗的家族成员的文书上^⑤。

由此可见,畏兀儿人是蒙古人的启蒙教师和蒙古帝国的第一批官吏;后来,畏兀儿籍的官吏随蒙古征服者一道进入诸文明国度,无论在中国或穆斯林地区,类皆位居显要,非当地文化修养远出其上者所能及。毫无疑问,从很早的时候起,文化就已经开始渗入,而且是从中国、

① 《原文史料选辑》,页159 (Mu'izz al-Ansāb; Бартольд,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мперии Чингиз-хана*, 页112)。

② Abel-Rémusat, *Tha-tha-toung-o*, 页61。〔如伯希和所指出的,塔沙统(Tashatun)系塔塔统阿(T'a-t'a-t'ong-o,据《元史》)之误读。塔塔统阿一名尚未能正常还原为畏兀儿语,但后半当为突厥语 tonga,意为“英雄”。参看 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页33-5〔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页27-9〕。〕

③ 《原文史料选辑》,页103(术外尼书;同书, Qazwīnī 刊本, I, 页17)。

④ 其中较早的已见于术兹贾尼书(Raverty 译本, II, 页1158);〔Nassau Lees 刊本, 页402作 al-tamghā〕。

⑤ 使用青印的例证之一,见拉施都丁书, Березин 刊本, 原文, VII, 页51; 译文, V, 页40。例中提到的人大约从大汗处带来致伊儿汗阿八哈的文书。阿八哈遵照文书的指示使来人在自己朝中任官。〔依照伯希和的意见,巴托尔德如此解释朱印与青印的用处,于文献无征。我们直接知道的蒙古君主的印文,仅有朱印一种。关于伯希和为青印提出的假定的解释,参看(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页35-42〔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页29-34〕。〕〔依照伯希和的意见(Notes sur le *Turkestan*, 页33-42),关于朱印的用途,有贵由与波斯诸伊儿汗的朱印可资证明,但巴托尔德又谓青印仅用于庄严隆重的文书云云,则未免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拉施都丁的记载。伯希和认为青印或与蒙古人用于证书册籍之类的“青册”(kök debter)有关;在远东,在白纸上写蓝字或在蓝纸上用其他颜色书写的文书中到处都有的,在忽必烈汗廷中当然也有这种青册。——C. E. B.〕〔参看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页50-2。〕

印度(佛教)、突厥斯坦(摩尼教^①与聂斯脱里教)等不同方面渗入畏兀儿这一天山斜坡上的国度的。不过,由于缺乏防止外来侵袭的屏障,畏兀儿人没有能够在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独特而持久的民族文化。至于今日,人们关于畏兀儿人的全盘历史发展,特别是关于畏兀儿文化的发展,尚皆语焉不详;晚近考古学上的发现^②,虽在这方面已经提供了一些线索,但要透彻了解这些考古发现的意义,仍有待于对文字资料,主要是汉文资料,进行一番深入的研究。在这里,我们仅能就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国度在十三世纪的情况加以阐述。根据奥菲的记载^③,哈刺契丹人和畏兀儿人有一部分崇拜太阳,一部分是基督教徒;概括说来,可以在他们中间找到犹太教以外的所有其他宗教,惟专就畏兀儿人而言,仍以基督教徒为最多。奥菲的同时代人对畏兀儿王国的组织业已十分熟悉,以致他们认为没有详加说明的必要。奥菲传述^④一则轶事时,说到畏兀儿人是缺乏尚武精神的和平民族。奥菲以外,普朗·迦尔宾也述及^⑤,在畏兀儿人中间,基督教徒为数最多。但实际上,畏兀儿人中间的基督教徒是否多于佛教徒,仍属疑问。八合识(bakhshi,梵文原作 bhikṣhu,比丘)一词,本来仅指佛教出家人而言,传入蒙古人诸国,则兼有“书写、文吏”^⑥等意义,于以知为蒙古人效力的畏兀儿文化阶层的代表人物,其大多数乃佛教僧侣。鲁卜鲁克比较详细地记载了^⑦畏兀儿佛教徒的一些情况,他说,畏兀儿佛教徒在拜偶像者中

388

R454

① 人所熟知,鄂尔浑河上的回纥于762年在洛阳遇到了摩尼教教士。参看 Chavannes 与 Pelliot, “Un traité”, JA, I, 页 177 以下(单行本, II, 页 201);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页 58 以下]。

② *Nachrichten*, Heft I. 关于更近地发现,参看 Barthold, *Stand und Aufgaben*, 页 1075-80, 此处列举了若干参考著作。有关本题更加完备的文献目录,参看 Stein, *Serindia*, 引言, 页 XXV 以下, 但此一目录脱漏了 Le Coq 的著作。就我所知,截至今日,还不曾有人综合从近年考古发现中得来的关于畏兀儿人的零散知识写出一篇详尽的专题论文。[参看下記关于畏兀儿人的较新的著述: Gabain, *Das uigurische Königreich*; Hamilton, *Les Ouighours*。]

③ 《原文史料选辑》, 页 99。

④ 同上书, 页 95。

⑤ Язиков 刊本, 页 128; Beazley 刊本, 页 69, 103, 144; [Малеин 译本, 页 18]。

⑥ 参照 Будагов 的字典 bakhshi 字下。

⑦ Michel—Wright 刊本, 页 283-7; [Малеин 译本, 页 18]。

间自成一“好像特殊的教派”(quasi secta divisa ab aliis)。畏兀儿人向北方祷告,合十下跪,俯首置前额于手上,他们的庙宇中有死人的塑像,行佛事时鸣钟。

鲁卜鲁克摘引了佛教徒的咒语嗡吗呢叭咪吽(Om Mani Padme hum)。据长春真人的记述^①,畏兀儿地佛僧身着红衣;这位旅行家还在畏兀儿地看到了道士,鲍乃迪修士大司祭对于畏兀儿地有道士一说深表怀疑^②。畏兀儿地在九、十世纪有摩尼教徒,业经穆斯林史料^③以及汉文史料^④在记载佛教徒时一并述及;到了十三世纪,摩尼教徒似已绝迹,但其教义仍在佛教与基督教的信条中有所残存。鲁卜鲁克曾和来自中国的一位僧侣互相辩难,后者持善恶二元论和轮回说甚力;通过这次辩难,鲁卜鲁克注意到,所有佛僧无不既相信二元论这一摩尼教异端,也相信动物灵魂的轮回。鲁卜鲁克甚而也曾遇到一位较有学识的聂斯脱里教僧侣向他询问,是否别有一个世界,动物到了那里得以摆脱强迫劳动^⑤。聂斯脱里教僧侣的这种概念可能来自佛教,与摩尼教无关;但以隐修士身分先于鲁卜鲁克到达蒙古廷的亚美尼亚人塞尔吉伊曾向鲁卜鲁克询问:“魔鬼在第一日从世界四方取土,和泥塑成人形,而由上帝赋予以精神”之说是否属实^⑥;塞尔吉伊素不知书,他的这种有关世界开辟论的见解,乃得自中亚,受摩尼教的影响,似无可疑。当

① 长春真人书,Кафаров 译本,页300;〔《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卷上,叶27〕;不见于布雷特施奈德书(Bretschneider, *Researches*, I)。参照Chavannes与Pelliot, “Un traité”, JA, I, 页317(单行本, II, 页279),此处将“红衣”改译“habit brun”〔赭衣〕。

② 长春真人书,Кафаров 译本,页406,注。沙畹与伯希和(Chavannes与Pelliot, “Un traité”, JA, I, 页317;单行本, II, 页279)指出,此处所说的道士当系摩尼教徒〔参看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页85-6〕。

③ Бартольд, *О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в Туркестане*, 页18;特别是亚库特书的原文(Ми'ят, I, 页840);关于佛教徒的记载,亦见于比鲁尼书(Athār ul-bākiya, Sachau 译本,页189)。

④ 特别是王延德行纪中的记载(《福乐智慧》,Радлов 刊本, ч. I, 页LXIX; Радл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б уйгурах*, 页100。B. B. 拉德罗夫误认这条材料是讲基督教徒的)。王延德行纪中此项记载,亦为沙畹与伯希和所征引,见Chavannes与Pelliot, “Un traité”, JA, I, 页308(单行本, II, 页270);〔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页82以下〕。

⑤ 鲁卜鲁克书,Michel——Wright 刊本,页356-8;〔Малеин 译本,页153〕。

⑥ 同上书,Michel——Wright 刊本,页332;〔Малеин 译本,页137〕。

时,畏兀儿佛教徒和今天蒙古佛教徒一样,都把圣典叫作 noms^①,这一希腊名词显系先由叙利亚人借用,然后通过摩尼教徒传入畏兀儿地。

就我们现在所知,畏兀儿佛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尚无在宗教上互不相容的情况,但聂斯脱里教徒曾采取一些措施以防与佛教徒相混同,为此他们避免鸣钟,祷告时亦不合十而向前伸手与胸相平^②。无论如何,民族感情仍较宗教感情为重,畏兀儿基督教徒镇海(Chingay)之所以庇护佛教徒阔尔吉思,即因阔尔吉思也是畏兀儿人之故^③。又畏兀儿基督教徒在宗教上的宽容程度,可于畏兀儿基督教首领人物出迎道士长春真人一事见之^④。另一方面,佛教徒^⑤和基督教徒^⑥却与穆斯林

① 《福乐智慧》,Радлов 刊本,ч. I, 页 XLVIII; Радл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б уйгурах, 页 60; 术外尼书, Qazwīnī 刊本, I, 页 44, “nomists” (numian) 一词,出于误解;抄本中的读音足以表明此词原作 tuinan (“toyins” [道人]),人所熟知,直到现在,蒙古境内仍以此词称呼贵族出身的喇嘛。十三世纪时,此词通用于广大地区(术兹贾尼书, Raverty 译本, II, 页 1157)。术外尼书印本也用了 tuinan 的读音(Qazwīnī 刊本, I, 页 44)。奥非(《原文史料选辑》, 页 83)曾引用谢吉克·本·伊卜拉欣·巴里希(生于八、九世纪之交)的记载,述及谢吉克在突厥斯坦遇到了一位身着红衣的僧人,亦述及中国语(多半是哈刺契丹语)称这些僧人为 toyins,印度则称之为 sthavira [大弟子、上座]。关于此词的解说,蒙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 指教,敬致谢忱。

[十三世纪的波斯及亚美尼亚作家均呼僧人为道人,波斯语作 tuin, 亚美尼亚语作 тоин. 关于僧人,术兹贾尼说过(Raverty 译本, II, 页 1157; Nassau Lees 刊本, 页 401)“那么一群从契丹来的异教苦行者(зуххад),还有从唐古忒和桃花石来的偶像教徒(бутпарастан, 即佛教徒),被人称为道人的,对贵由发生了影响”。在 Nassau Lees 刊本中, tuin 一词到处被校订者误改为 nuin; Raverty 译本中作 Tuni. 甘扎克人契拉利(Киракос Гандзакский)写道(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ов по армян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II, 107):“在鞑靼人中间住着一一些道人,这些道人都是术士和巫师,借助于特别邪恶的魔力能使马、驼和毡制的偶像说话。他们都是僧人,剃去鬓发,胸前垂着黄色念珠。他们崇拜各式各样的东西,尤其崇拜释迦牟尼和弥勒。”][大家公认,蒙古语的 toyin, 突厥语的 toyin, 皆源出汉语的“道人”(tao-jen),意即僧人;参照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II, 648-51, No. 993. —C. E. B.]。

② 鲁卜鲁克书, Michel—Wright 刊本, 页 283-4; [Малеин 译本, 页 106-7]。

③ 术外尼书, ГПБ IV, 2, 34 抄本, 叶 185; Qazwīnī 刊本, II, 页 228。伯希和教授(Pelliot, Chrétiens, 页 634)认为阔尔吉思可能是基督教徒,因为他的名字似系 George 一名之音转;但据术外尼(术外尼的父亲与阔尔吉思相识)的记述(Qazwīnī 刊本, II, 页 242),阔尔吉思原系偶像崇拜者(but-parast),晚年始成为穆斯林。[But-parast 一词,可泛指一般偶像崇拜者,但通常专指佛教徒而言。—C. E. B.]。

④ 长春真人书, Кафаров 译本, 页 301, 407, 注; Bretschneider, Researches, I, 页 66;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 卷上, 叶 27]。

⑤ 《福乐智慧》, Радлов 刊本, ч. I, 页 XLVIII; Радл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б уйгурах, 页 61; 术外尼书, Qazwīnī 刊本, I, 页 44。

⑥ 《原文史料选辑》, 页 111(术外尼书; 同书, Qazwīnī 刊本, I, 页 214)。

是不可和解的仇敌,尽管如果我们相信鲁卜鲁克的记述^①,聂斯脱里教徒曾经吸取了穆斯林的一些习俗,如定金曜日为假日,入教堂必须净身等是。追溯这种敌对关系的由来,与其说是出于宗教的动机,毋宁说是先因争夺商业的利益,后因争夺仕进的机会较为切合事实。

总的说来,宗教对于畏兀儿人没有发生多大影响,几乎无裨于畏兀儿人道德和知识水平的提高。畏兀儿人依然沿袭与寡母成婚的习俗^②,同时在蒙古人中间,由于佛教的影响,此俗已不复存在^③。异教徒乃至“不虔诚的基督教徒”都还保有与老年人以油腻食物以速其死的陋习^④。后来任帝国中书右丞相的基督教徒镇海在与长春真人交谈时,有不少十分迷信的语句,长春真人不以为然,默不作答^⑤。畏兀儿人勇武精神的消失,虽与佛教和基督教提倡清修(无分何时何地,提倡清修常比宣扬教条更能吸引人民群众)不无关系,但其主要原因仍在于畏兀儿人之转变为商业民族。

我们不很了解畏兀儿诸教士说教的内容。聂斯脱里派教士对其门徒们阐述基督教义的梗概,讲解福音书,使之熟悉基督教信仰的符志^⑥;十分可能,佛教经师也宣扬佛教的一些基本原则。但是,成吉思汗和接续他的几位大汗并没有惟这些开导心灵的谋臣们之言是听,而是单纯把他们作为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采用畏兀儿文字的头一项成就,是把蒙古习惯法法典化,写出札撒(Yāsā),札撒和成吉思汗的训言(必里克,bilik)在长时期内是蒙古君主施政的最高准则(参看上文R89)。在成吉思汗的亲信中,第一位发挥畏兀儿教育的效用的大概是

① Michel—Wright 刊本,页 293;〔Малеин 译本,页 111〕;Oppert, *Der Presbyter Johannes*, 页 142。

② 《原文史料选辑》,页 116(术外尼书;同书,Qazwini 刊本,Ⅱ,页 226)。

③ Васильев, *История и древности*, 页 246。

④ 普朗·迦尔宾书,Языков 刊本,页 98—100;〔不见于 Малеин 译本;此甚为可疑之报道非普朗·迦尔宾书所原有,乃他人所增入〕。参照 Васильев, *История и древности*, 页 254。

⑤ 长春真人书,Кафаров 译本,页 296,298—9;Bretschneider, *Researches*, I, 61, 64;〔《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卷上,叶 24, 26〕

⑥ 鲁卜鲁克书, Michel—Wright 刊本, 页 293;〔Малеин 译本, 页 112〕;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ов по армян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I, 11。

R457

391

失吉忽秃忽那颜。失吉忽秃忽出生于塔塔儿部,由成吉思汗之妻收养成人^①;成吉思汗派他审理法律案件。依据蒙古史诗即《元朝秘史》的记载,成吉思汗向他指示:“如有盗窃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已后不许诸人更改”^②。在《元朝秘史》一书中,还见不到断事官的专称(札儿忽赤, yarghuchi)。其后,札撒归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掌管^③。

R458

各地区的民政长官,即“大八合识”(Great Bakhshi)一职,用汉语职衔,称为太师(taishi)^④。成吉思汗在位时,中国境内蒙古政权的文职首脑是一位女真人,即以太师为职衔^⑤。统率哈刺契丹辅助军和女真辅助军的将领,被称为大师(daishi),拉施都丁释其意为“万户长”(Commander of a tümen)^⑥。但是,无可置疑, daishi 与 taishi 乃同一职衔之异译^⑦。

① 拉施都丁书, Березин 刊本, [原文, VII, 页 73]; 译文, V 58; XV, [原文, 页 201-2; 译文, 页 136]。【据《元朝秘史》, § 135, 138, 203, 失吉忽秃忽系由成吉思汗之母诃额仑抚养成人。】

② 《元朝秘史》, Кафаров 译本, 页 115; [汉文本, 卷 8, § 203]。拉施都丁书的记述(Березин 刊本, 原文, VII, 页 75; 译文, V, 页 59), 失吉忽秃忽忠实地完成了所接受的任务, 断察严正无私, 决不轻信在威逼之下得来的供词; 他的科断垂为判例。[伯希和指出, 卡法罗夫将“青册”误译为“黑板”(черные доски), 其后 В. 巴托尔德与 Б. 符拉基米尔佐夫都沿用了这一错误的译名; 而夷考其实, 《元朝秘史》汉语译文中之“青册”一词, 乃 kökü dābtār 的直译, 其中记载着将属民分配于蒙古贵族的情况与审理法律案件的科断; 参看 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页 38-40; [冯承钧,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 三编, 页 30 以下]。]

③ 多桑, 《蒙古史》, II, 页 100 [冯承钧译本, 上册, 页 208]; 《原文史料选辑》, 页 104-5 (木外尼书; 同书, Qazwini 刊本, I, 页 29)。

④ 拉施都丁书, Березин 刊本, 原文, VII, 页 190; 译文, V, 页 143; XV, 原文, 页 207; 译文, 页 138。

⑤ Васильев, История и древности, 页 223。[伯希和对此处《蒙鞑备录》的译文予以不同的解说; 参看 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页 46-9 [冯承钧,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 三编, 页 38-41]。]

⑥ 拉施都丁书, Березин 刊本, XV, 原文, 页 214; 译文, 页 143。

⑦ [如伯希和所指出的, Н. И. 别列津误将 vashai 读作 daishi, vashai (vanshai, 参照拉施都丁书, Березин 刊本, XV, 原文, 页 214) 一词, 乃汉语“元帅”的对音(参看 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页 42-3 [冯承钧,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 三编, 而 34-5])。伯希和又指出, 蒙古语中并无“大八合识”(拉施都丁解释 taishi 为 bakhshi-i buzurg) 一词, 太师当系中央高级官员的通称(参看 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页 44-5 [冯承钧,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 三编, 页 36-8]。)]